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周 膺 吴 晶 / 著

Shi Jie Wen Ming Lian Xu Ti
Zhong De Liangzhu Wen Hua

世界文明连续体中的良渚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 膺 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美学专业，师从叶秀山先生，研究方向为中西美学比较。现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对中西哲学和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有较多积累，涉猎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较多学术领域。并对造型艺术有独特的领悟与解析，也善实际试验。已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美丽洲：良渚文化与良渚学引论》《美丽旧世界：良渚文化与杭州的缘起》《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东方文明的曙光：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南宋美学思想研究》《斜阳嘉树：宋史随笔》《华贵天城：宋版杭州》《宋朝那些事儿》《杭州史前史》《杭州经济史》《西溪湿地》《西溪湿地的文化与历史》《西溪湿地保护利用模式研究》《洪氏家族与西溪湿地》《钱塘望族：杭州洪氏家族文化史》《韵含水石：杭州洪氏文化遗存》《西溪望族》《西溪集古楹联匾额》《西溪的宗教文化》《文化遗产的制度性保护：杭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城市美学》《现代城市美学》《后现代城市美学》《城市文化生态学》《书法审美哲学》《创意时代：“创意良渚”的思想实验》《物联网经济与物联网文化》《中国的房地产消费文化》《晚清民国杭商研究》《杭商的文化学特征与杭州人文精神》等专著，校勘《杭州丁氏家族史料》《杭州史料别集》《杭州稀见文献辑刊》《烨烨斯文：杭州洪氏人物作品》《何天行文集》等文献，发表论文60余篇、散文随笔100余篇。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周膺集》《第一种美》等美术专集，并举办美术个展。



吴 晶 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浙江省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致力于研究唐宋文学、历史和浙江地域文化。出版《永嘉四灵：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合传》《百年一缶翁：吴昌硕传》《画之大者：黄宾虹传》《古来才命两相妨：李商隐传》《洪昇与西湖》《西湖诗词》《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西溪湿地》《西溪与蕉园诗社》《南宋美学思想研究》《杭州史前史》《杭州经济史》《西溪湿地的文化与历史》《西溪望族》《西溪集古楹联匾额》《西溪的宗教文化》《巍然人杰：杭州洪氏人物》《文化遗产的制度性保护：杭州市的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城市美学》《城市文化生态学》《物联网经济与物联网文化》《中国的房地产消费文化》《晚清民国杭商研究》等专著，校勘《杭州丁氏家族史料》《杭州史料别集》等文献。

Shi Jie Wen Ming Lian Xu Ti Zhong De Liangzhu Wen Hua

世界文明连续体中的良渚文化

ISBN 978-7-5161-8697-8



定价：55.00元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世界文明连续体中的良渚文化

周 膺 吴 晶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明连续体中的良渚文化 / 周膺、吴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61-8697-8

I. ①世… II. ①周… ②吴… III. ①良渚文化—研究
IV. ①K87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275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鹏
特约编辑	金 泓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37 千字
定 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沈 翔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孙 璐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张旭东 林正秋

周 膺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绪 言	1
第一章 良渚文化与龙山时代	5
一、良渚文化的发现与考古学定性研究	5
二、满天星斗与多元互动	10
三、最后的夷与双螺旋结构	15
第二章 隐在非亚美文化底层与显在青铜世界体系	27
一、自然内外的文明	27
二、非亚美连续带	36
三、全新世时间连续体	41
第三章 人力型经济与自然连续统	53
一、作为自然适应性反应的生业	53
二、从渔猎采集到联系性经济	59
三、人力金字塔及其限度	68
第四章 农业根性与城乡连续统	75
一、城乡一元与大农业社会	75
二、聚落分层与聚合	80
三、农业文明人	91
第五章 巫术宇宙观与巫政连续统	103
一、自然神的变形与政治操纵	103
二、巫幻统治与巫幻文明社会	109

三、财富的政治性集中	115
第六章 艺术、神话与礼仪：原创与因循	123
一、单向艺术创造与极权话语	123
二、艺术原创与对科学技术的节制	132
三、艺术在时间序列中的因循	143
第七章 现代转换的生态危机与文明形态的更化	149
一、连续中的破裂	149
二、重回连续世界	155
三、破裂中的有益经验	161
主要参考文献	171
一、外文文献	171
二、中文专著	173
三、中文论文、研究报告	178

绪 言

张光直根据韦斯登·拉巴 (Weston La Barre)、彼得·T. 佛斯特 (Peter T. Furst) 等的亚美文化底层概念, 提出环太平洋文化底层、玛雅—中国连续体的著名论点。所谓文化底层, 指存在于不同区域中一种或数种来源相同、年代古远并在各自文化序列中处于底层、带有底层特征的共同的文化因素。文化底层对文明的形成和长期发展有决定性作用。北纬 30° 的农耕世界或许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口迁徙中即构建了农业文化底层, 形成非亚美连续带。张光直认为, 在这一区域中, 只有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为代表的技术或商业特征强烈的西方式文明是个特例, 其他农业特征强烈的非西方式文明可以描述为一个共同的连续体。中国文明则不仅没有跳跃式发展, 同时还具有历史连续性。张光直还认为, 农业性的非西方式文明与自然也是连续的, 即具有生态性。西方式文明与自然则是断裂的。作为玛雅—中国连续体的典型范例、中国 5000 年文明史最有力的实证之一的良渚文化, 在世界文明连续体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因而对它的研究在世界文明连续体的研究中也具有纲领性。

良渚文化之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与自然保持连续。其农业生产率较此前的新石器文化有较大提升, 特别是犁耕农业将规模农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规模农业并未超过自然的承载力, 能与自然构成良性循环。良渚文化还形成了后代中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格局。财富的创造或积累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 财富的集中借政治程序 (人与人的关系) 而不是技术或商业程序 (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以及农业社会体系则为政治操纵创造了条件。手工业的专门化和农业的规模化为初级贸易创造了条件, 但贸易主要限于玉器、漆器和精致陶器、木器等范围之内, 且总体上为“官方”控制, 量能十分有限, 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可以维持生态平衡。并且, 它还有利于形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从而为连续性历史发展埋下伏笔。中国后来的历史虽

然主要是中原文明生发的，但良渚文化与中原文明质性一致，它最终也融入中原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基因，并未形成真正的断裂层。

但是，良渚文化或中国文明也内含超级功利主义或重实利基因，存在着与自然断裂的巨大可能性。自明代中后期引进美洲等地的甘薯、玉米等农作物以后，不仅使中国人口爆炸，而且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范围水土流失，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不过，由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尚没有形成现代机器工业体系，所以空气、水、土壤环境的人为破坏仍不足以危及人的基本生存安全。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超级功利观与功能强大的现代机器结合，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上资源消耗最大、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社会风险巨大。

西方式文明的非农业特征使张光直简单判断其与自然断裂。事实上，不过度依赖田地开发、节约和深度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西方式文明虽然跳跃式非连续发展，却比非西方式文明与自然更具有连续性。苏美尔文明、希腊文明不仅十分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从哲学、科学上深入探索世界的有机性、整体性，开掘了现代生态学源脉。当现代工业造成巨大的生态危机以后，西方传统文化中包括有机论、整体论和人性论在内的生态纠偏机制便自动启动，以生态学、生态文化学或生态文明纠正问题。虽然由于人口增长、利欲膨胀，西方世界也未能避免生态恶化，但相比于非西方的“农业性大机器”，西方文明还是表现得有节制得多。当今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资源利用绩效以及环境状况相对较好，而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埃及等则成为全球资源消耗最大、污染最严重的国家。1995—1999年，一群科学家在印度洋展开实验和研究，发现印度洋、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南部上空长期盘旋着一个面积相当于美国大陆大小、厚度约3 km的褐色云团，将其命名为“亚洲褐云”（Asian Brown Clouds）。此说甫一提出，各种针对亚洲环境的指责和非议随之而来。进一步研究发现，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因此2003年在中国学者的建议下，“亚洲褐云”更名为“大气褐云”。2008年11月13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发表的《大气褐云：亚洲区域评估》指出，由燃烧化石和生物燃料所形成的大气褐云（Atmospheric Brown Clouds）与温室气体一道对亚洲的气候、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造成巨大影响。褐云和气候变暖改变了原有的东亚季风模式，并导致中国“北旱南涝”的局面进一步加剧。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和印度的极端降雨天气，即降雨量超过100 mm的天数明显增加，降雨量超过150 mm的大暴雨天数则翻了一番。为大多数亚洲河流提供水源的冰川，即印度—库什—喜马拉雅—中国西藏冰川受到巨大威胁，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融化。自1950年以来已经缩小了5%。而中国近4.7万座冰川在过去1/4个世纪里缩减了3000 km²。^[1]

直至今日，中国并没有真正实现现代化，后现代化为时更远。从文化

^[1] 陈冰：《从ABC到霾》，贺莉丹：《城市空气污染调查：广州怎么了》，《新民周刊》2009年第14期。

性质来判断，当今的中国不过是“机器农业社会”。如前所述，这种“机器农业社会”潜藏着足以毁灭国家、民族的十分巨大的生态危机。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对玛雅—中国连续体或非亚美农业连续体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发掘良渚文化等的优秀生态文化因素，通过比较汲取西方式文明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改造传统文化，构建生态社会。

第一章 良渚文化与龙山时代

一、良渚文化的发现与考古学定性研究

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器物很早以前即已出土。考古资料显示，春秋战国之际的一些墓葬埋藏着良渚文化玉器。江苏吴县严山春秋玉器窑藏（有人认为为吴王墓葬）出土琮、璧等多件良渚文化玉器。^[1]浙江安吉递铺垆坝战国墓出土良渚文化玉璧。^[2]南宋官窑、龙泉窑出土多件琮式瓶，显然模仿了良渚文化玉琮造型。清代乾隆皇帝收有许多传世玉器，并题了许多玩赏御制诗。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5件琢刻御制诗的玉琮中有2件为良渚文化玉琮（编号为故玉2823和4183）。由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瞿中溶《奕载堂古玉图录》、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大澂《古玉图考》和1936年端方《陶斋古玉图》可知，清季传世或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已不少。《古玉图考》著录了一批良渚文化玉器。其中31件玉琮中的“大琮二”和“组琮十一”可确定为良渚文化晚期器物。另有1件神人兽面纹饰“方琬”也是良渚文化器物。^[3]《陶斋古玉图》原稿本缺损较多，但仍存“璧、琮以次百五十余器”，其中良渚文化器物著录数量超过《古玉图考》。如“镇琮三”“组琮四”“琮六”“琮七”“琮九”等为典型器，六龙首纹玉环“琬”和琢纹锥形器“玉笄三”也较典型。^[4]清末徐寿基《玉谱类编》和刘心白《玉纪补》等著作将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地点明确指向“安溪”和“双桥”，“安溪土”“双桥土”成为古玉行中“南土”的代表。古玉行中也有更直接的“良渚古玉”之称。安溪为杭州市余杭区一镇，后并入良渚街道。双桥即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双桥村。晚清时良渚、双桥一带出土的古玉已闻名遐迩。到民国时期，良渚文化玉器风靡市肆，一时盗挖成风，有的还辗转流于海外。据说良渚一个洪姓农民曾挖到几担所谓“玉塔”“玉饼”和“玉节”到上海出售，使之流失于海外。1949年前后古董

^[1] 姚勤德、龚金元：《吴国王室玉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 安吉县博物馆：《安吉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3] 吴大澂：《古玉图考》，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五年（1889年）版。

^[4] 端方：《陶斋古玉图》，上海来青阁民国25年（1936年）版。

商卢芹斋等通过到美洲、欧洲展销整批出售。全球各大博物馆基本上都收藏有良渚文化器物。

中国考古学发端以后，考古学家开头把眼光集中于黄河流域，对北京周口店、河南渑池、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河南后岗等遗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考古发掘，很长一段时间只视远古江南为“化外”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上海求学的慎微之返回浙江湖州老家度假，拣到钱山漾遗址石器。后于民国23年（1934年）趁干旱再次采集，结果发现了钱山漾遗址。民国9年（1920年），卫聚贤在南京栖霞山发掘六朝墓时找到一些良渚文化石器。嗣后陈志良在江、浙许多地方发现属良渚文化的被称为“吴越民族先期文化”的遗物。杭州籍学者何天行、施昕更慧眼识珠，很早便从田野考古资料中注意到中国文明的多元因素，发现了良渚文化，不仅奠定了长江文明考古学的基础，而且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

良渚文化及其中心遗址良渚遗址的最早发现得缘于何天行的工作。民国24年（1935年），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老和山遗址出土陶器、石器，西湖博物馆随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发掘，正在复旦大学求学的何天行注意到了此事。他通过对杭州一些古玩市场的调查，即刻又找到了新的同类型文化的线索，于这年暑假对老和山遗址和余杭区良渚街道、瓶窑镇的良渚遗址区进行了考察。在良渚街道荀山和瓶窑镇长命桥一带发现了一些遗址，并征集和采集到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包括一只刻有陶文的黑陶盘。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卫聚贤，受到卫聚贤重视。民国25年毕业后，他又采集到相关文物100多件。当时河南安阳后岗黑陶和山东龙山城子崖黑陶已发现，他加以对照，并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要了殷墟陶器和卜辞实物图片进行比较，意识到良渚一带的出土物当是一处典型的江南远古文化遗存。民国26年（1937年）初，他又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向考古学家董作宾等陈述，并出示了实物，判断得到进一步确认。后经实地反复调查，何天行于民国26年4月写出考古报告《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由蔡元培题写书名，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出版。民国25年2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以研究吴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的吴越史地研究会。8月30日，吴越史地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卫聚贤为总干事。会上提出“吴越文化”新概念，倡导“吴越文化”考古研究。由卫聚贤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成为发表吴越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阵地。《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第一种出版，足见其开创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

《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运用西方考古学方法对层位和器物进行了系统测量和标注，在当时属相当严谨。在系统归纳、整理、描述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考古学文化分析，而不是简单的器物介绍，最早使良渚文化纳入现代考古学范域。《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共分5部分，即绪言、

遗址的发现、地层的大概、遗物的种类（分石器、黑陶两部分）、结语。每一部分由独立思考提出独到的见解。如绪言中写道：“这次的发现，不但是南方考古界的创获……而且因为浙江在春秋战国以前绝少历史上真实的史料，文化不彰，向以为文身断发的蛮荒境界。现在发现了这样优秀的文化遗迹，可见浙江的远古文化本极悠久，将吴越文化的源流拉长了几千年。不独借此补充文献上所欠缺的材料，且从中国文化起源与发展而论，这次的发现，亦不啻为东南的古文化奠一新的基础与途径。”^[1]所附图录黑陶豆盘体口沿纹饰是目前发现的最接近文字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书后附卫聚贤《中国最古的文字已发现》一文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何天行：《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载何天行：《何天行文集》，周膺、何宝康编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何天行（1913—1986年），字摩什，浙江杭州人。父亲何公旦是杭州名医，当过慈溪知县，胞弟何任曾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胞姐何谳是潘天寿夫人。何天行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预科、中国公学大学部、复旦大学，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图书馆主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浙江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上海市文化局职员、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研究员等职。他有很高的人文素养，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对先秦历史等有很深的研究。不仅最早发现了良渚遗址，20世纪50年代对90年代发掘的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即有指证。

何天行对《楚辞》颇多研究。对《楚辞》及其作者的怀疑古已有之。民国10年（1921年）四川存古书局出版廖平《楚辞讲义》一书，该书提出《离骚》为秦博士所作的观点。胡适于《读书杂志》民国11年（1922年）第1期（《努力周报》增刊）发表《读〈楚辞〉》一文，对屈原的存在质疑。许笃行于民国24年（1935年）第4期《浙江省图书馆馆刊》发表《楚辞识疑》一文，称《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怨刺汉武帝之作，并指出《离骚》与《淮南子》的一些相似之处。何天行发挥廖平、胡适、许笃行的观点，较系统地论证《离骚》为淮南王刘安所作。他先于民国27年（1938年）6月15日在吴越史地研究会主办的《楚辞研究》上发表《楚辞新考》一文，民国37年（1948年）修改并更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被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称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2]1951年3月17日、3月31日、4月28日、5月12日，朱东润在《光明日报》“学术副刊”以《楚辞探故》为总题连续发表《楚歌及楚辞》《离骚的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4篇论文，论证刘安作《离骚》的观点。5月26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一文，反驳朱东润的论点。又在附记中说：“何天行有《楚辞作于汉代考》（1949年中华书局出版），其自序云乃十年前之旧作。朱东润说多与之相同。朱与何不知是否一人？”郭沫若还组织杨树达、沈知方发表了4篇批评文章。何天行次年经李青崖介绍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在上海工作时间不长。1956年

^[2]〔日〕稻畑耕一郎：《屈原否定论之系谱》，载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编：《中国文学研究》1977年第3期。

经汪馥泉介绍去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工作，但次年即回家休养直至去世。何天行后半生仍然坚持考古调查和学术研究，写了大量论著。“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大多被毁。

比何天行稍晚，施昕更也对良渚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施昕更（1912—1939年），初名兴根、鑫赓，浙江杭州人。出身于良渚镇（现良渚街道）一个店员家庭，家境贫寒，但自幼聪颖，虽仅毕业于浙江省立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却因在西湖博览会上工作出众而入西湖博物馆工作。民国23年（1934年）代表西湖博物馆出席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地质会议，次年著成《浙江地质矿产志》，颇显才华。民国24年参与老和山遗址发掘时，施昕更也注意到此地的出土物与其家乡良渚一带的极相类似，萌生了回乡考古的想法。从施昕更后来的论述以及何天行对其《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的说明来判断，施昕更的工作应是在何天行的基础上做的。其主要发掘坑何天行大多已有著录。但施昕更也有独立的发现，并展开了更系统的田野考古调查。民国25年（1936年）11月3日，他在良渚街道荀山棋盘坟一个狭长的干涸水池断层中发现了“黑色有光的陶片”。通过与山东城子崖黑陶的对比，他认定这是“江南远古文化”。在西湖博物馆馆长董丰茂的支持下，施昕更于12月1日至10日、12月26日至30日主持了两次棋盘坟遗址田野考古发掘，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为弄清这一考古学文化的范围，他又于次年3月8日至20日主持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在良渚街道横圩里、横村塘、大雄、后湖村和瓶窑镇钟家村、金家弄、宋村一带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或遗存共13处之多。据他自己说，试掘的过程中，在当地一般无知的农民中造成轰动，但遭多重阻难。有的指责他窃以自肥，有的则在晚上私自盗掘，毁坏农田而归罪于他，使之成为众矢之的。但是他克服了重重困难，采集到数十种陶器、石器、玉器，掌握了第一手充实的材料。民国26年4月，西湖博物馆邀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梁思永到良渚考察，两位专家对施昕更的工作评价很高。约用了半年时间，施昕更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但经过多重周折，才于民国27年（1938年）6月由浙江省教育厅出版。施昕更于该书出版的第二年病逝，年仅27岁。

施昕更根据考古调查把良渚遗址分为三大区，如发表的论文副题所指，他只是做了第一步第二区的考古工作。这份关于第二区的考古报告分为绪言、遗址、地层、遗物和结论5个部分。第四部分重点从4个方面对黑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一是将良渚黑陶与山东城子崖黑陶在陶质、陶色、纹饰、器类、制法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有一些共同因素，但断定良渚黑陶是受山东黑陶“传播影响而发生，为同一文化系统和产物”。二是对良渚黑陶的陶色、陶质、纹饰、制法等加以详细的分析和推测。除注意到陶器制作普遍使用轮制法留下的特征外，还指出一些小件器物以及器耳、器把、器足等是用手捏制的。纹饰形成有的属于制作时留下的旋纹